

宁夏社会科学“九五”
规划课题

中西文献交流史

潘玉田 陈永刚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献交流史/潘玉田、陈永刚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7

ISBN 7-5013-1638-4

I. 中… II. ①潘… ②陈… III. 文献-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784 号

书名 中西文献交流史
著者 潘玉田 陈永刚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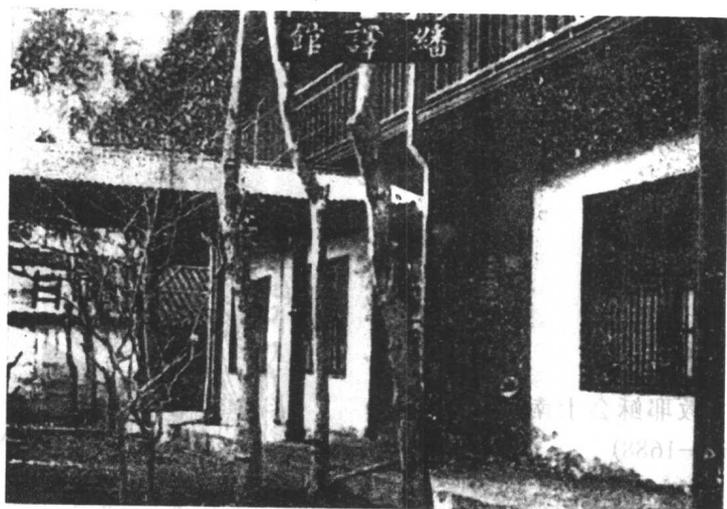
书号 ISBN 7-5013-1638-4/K·296
定价 15.00 元



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
(1552-1610)



天主教耶穌會士南懷仁
(1623-1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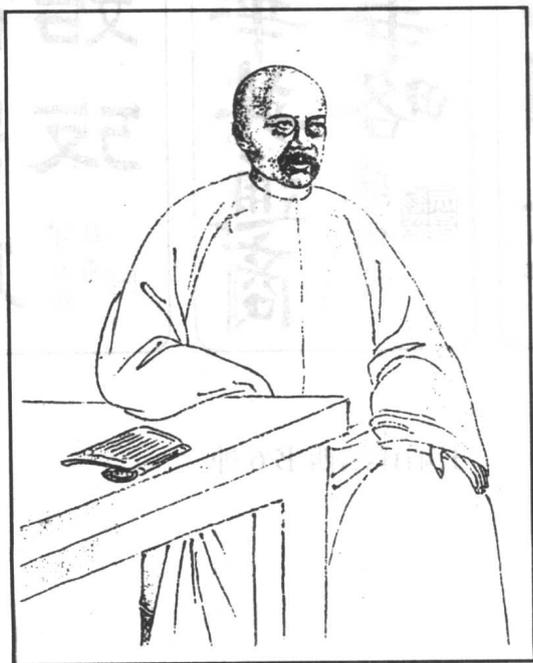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地學淺釋

华蘅芳及其译作《地学浅释》



严复画像

泰西著述攷

朱榮棟拜題

重學淺說

西學圖說

榮棟拜題

西學原
始攷

伊五知
執品

華英通商

事略

蕤齋署

西國天學

源流

蕤齋署

王韜譯編西書6種

光緒二年孟秋中浣

中西關係略論

活字板印

《中西关系略论》

自西徂東

《自西徂东》

泰西新史攬要

節刻本

活字板印



《泰西新史攬要》

中東戰紀本末

光緒二十九年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龔心銘

上海廣學會譯著
圖書集成局鐫版

《中东战纪本末》

予因多聞撰其著者而從之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博愛者纂

然世俗每月統記傳序

無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無始。神創造天地人萬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養我們世人。故此善人無非敬畏神。但世上人神多。說錯了。學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現管其眾。所以用一個天字。括着神亦有之。既然萬靈。人皆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學者不可止察一地方之各物。單

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道光癸巳年六月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愛漢者纂

新州

大連也。昔曾直而好義。察于而親色。感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名色取仁而行。遠名之不敏。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此同仁。
在廣州府有兩個朋友。一個姓王。一個姓陳。兩人皆好學。盡行義。因相與好。每每於工夫之暇。不是你尋我。就是我訪你。且陳相公與兩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規矩。因性來慣了。情性殊洽。全無一點客套。雖人變化却殊覺莫了。不打緊。想一兩來。見王相公說道。小弟今日偶然聽聞外國的人。募捐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其書狀舉。工道。晚生大可取。總有妙才。轉譯

第一份在中国大陆创刊的中文期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封面

绪 论

(一)

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人们需要将自己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更广泛地运用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从而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力和水平，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文化的积累，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之所以能积累，正是因为有一种记录方式把文化记录下来，流传开去，形成文化遗产最重要的部分——文献。文献，正是一种记录文化的方式和手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所以，人们称那一部分已经物化了的的文化——文献，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丰富的文化资源。文献，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录，也是人类文明的存贮和积累库。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史、社会制度的发展史、人类的自身的升华进化过程等等都被记录在各种文献当中。在人类社会的更迭中，后人都要继承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各种文献是人类共同财富中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不仅是文明的成果与标志，而且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因

与源泉，它为后世获得知识科学文化提供条件。

文献，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绚丽多彩。在文献当中，积累着无数的事实、理论、技术、实验和方法，大量的数据、图表，以及各种假设、定义、科学构思和分析等第一手资料。在文献当中，可以反映出政治、经济、民族、文字、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律、外事、科技、医药等等各行各业的面貌和特点。通过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和感知世界；通过文献我们可以得到精神的娱乐和精神的享受；通过文献我们可以去探索和改造世界。文献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缩影；文献——它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全部活动中，“交流”是须臾不可或离的。“交流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不仅把交流看作是交换新闻和信息，而且看作是包括一切传递和分享各种思想事实和资料在内的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活动”^②。文献交流是人类交流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在文献交流过程中，文献本身是交流的对象，同时又是交流的工具。通过文献的交流与传递将一部分人的知识、思想、信息在另一部分人中广泛传播开来，并通过另一部分人的接受，产生新的社会效益。通过文献的交流与传递使人类把社会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而且借交流的有效性，为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文献使人类的交流传递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通过文献我们可以跨越时空，通过文献我们可以和世界各个角落对话。离开了文献的交流和传递，人类的文明发展是

不可想象的。因此，文献的交流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交流、地区之间的交流，它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流。所谓中西文献交流，最早是指中国与西域地区国家的文献交流，后指中国与以西国家的文献交流，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献交流，之所以采用“西”的概念一是约定俗成，二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中西文献交流活动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活动，它既包括中国文献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交流，也包括西方国家的文献在中国的传播交流。考察各种文献交流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文献交流活动整个过程是由两个基本环节构成的，一个是文献的传播者，一个是文献的接受者，离开了文献的传播者，文献的交流就没有了动因，没有了文献的接受活动，文献交流就无法完成，文献的传播也就变成了一种虚幻的存在，所以文献交流是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双边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传播活动发生背景以及传播主体传播了什么内容，而且也要看到接受者的吸收利用活动和扬弃过程以及在接受者那里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因此，传播和接受构成了文献交流活动的全过程。这就是我们研究整个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基点。

(二)

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历史，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考察整个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历史，从最早汉代中国与西域邻国的交流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丰富多彩的文献交流活动。为了反映中西文献交流活动历史的重点，我们将整个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论述，这就是汉代至元代、明末清初、清中期、清末。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有文献往来。如，外国使节来往时，携带的“国书”等。周王室设有“象胥”之职，专管域外文献的传达和翻译，那时就“文献”的形态来说，是原始的，多属于竹简、木简之类，文献交流活动也是原始的、简单的。到了汉代才有现在意义上的文献交流活动。因此，我们认为汉代至元代是中西文献交流活动发生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与以西的国家地区发生了三次大的文献交流活动——与西域邻国，与印度、与欧洲。与西域邻国的交流是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产生了有关西域情况的文献，《史记》中“大宛列传”的资料大多来源于此，东汉班超、班勇出使西域。所撰《西域记》为中西文献交流史上第一部重要文献。与印度的文献交流活动，主要是以中国僧人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展开的。取经译经活动长达800余年，西行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达50多人，印度来华的高僧也近20人。西行僧人将大批的印度佛教经典引进中国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将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的活动。产生了法显、玄奘等中印文献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也产生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仙法传》等著名著作，这些著作详细记录了东亚、南亚各国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等等。

与欧洲的文献交流活动到了唐代才开始，最早传入中国的欧洲文献是景教和基督教文献。进入元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献交流有了新的形式。这就是那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使节、商人将看到和了解到的中国情况写成了一批游记类的书籍在欧洲各国出版发行。这就促成了有关中国情况的文献在欧洲的传播。比较著名的有（意）柏郎嘉宾的《蒙古史录》（又名《柏郎嘉宾行记》）、（法）卢白鲁克的《行记》、（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意）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其中以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最为著名。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献交流活动，是以耶稣会士为主要传媒，以中西文献双向交流为主要特征，以传教文献、科技文献、儒学和中国历史文献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耶稣会士来华目的是为了传布基督教，为了传教采用的是学术传教的策略。在传教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文献传播活动，使传教和传播科学文献融为一体，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科技文献，其数量约有上万部。这批书籍经耶稣会士带到中国后，经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的共同翻译，产生了我国最早的西方科技文献的中译本，其中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书籍就有120多种。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如，汤若望著《主制群征》、《远镜说》，前者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医知识；后者为西方光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始。南怀仁的《穷理学》最早向中国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命题和著名的“三段论”。作为主要传媒的耶稣会士还将大批的中国文献带往欧洲，并且翻译了大批的中

国文献，其中儒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数量最大，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介绍儒家思想最为完备。耶稣会士还撰写了一批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献在欧洲传播，《利玛窦日记》是这批著作的代表作，此书第一次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文明。它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传向欧洲，明末清初的中西文献交流活动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清中期的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开放型的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由高潮迅速转入低潮，走向衰落，处于“万马齐喑”的沉寂状态。这个时期乾隆下令禁海闭关，禁止华人出洋和侨居国外，将多口贸易改为一口贸易，指定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规定朝廷官员不准外教接触，客观上断绝了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文献交流活动赖以存在的开放条件。如，1760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向朝廷敬献《坤图说》，最早把代表欧洲天文学最新成果的哥白尼学说介绍到中国，清政府视为“异端邪说”不予接受。清政府的这种态度，甚至还影响到对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文献的接受。如，利玛窦的《万国图》，首次向中国介绍了世界地理新知识、五大洲概念、经纬度、气温带等等，而乾隆年间编的《清朝文献通考》，认为五大洲之说，不过是沿袭中国古代“大九州”的神话而已。当然，在知识阶层中，不乏有识之士，积极接受利用西学科技文献，如：数学家明安图利用西方最新数学成果与其弟子编成《割圆密率捷法》，数学家戴煦，创立了指数为任意有理数的二项式，简化了对数表的选法。

清末的中西文献交流活动，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局面。从传播主体看，既有英美传教士又有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些力量中，林则徐、魏源代表了国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批留学日本、留学欧美的学生都成为传播西学文献的主导力量，彻底打破了过去由传教士传播西学文献的一统天下的地位。从文献交流的内容看，在此以前中西文献交流的内容大多属传教文献和科技文献，而清末的文献交流活动除了大量引进传播西方科技文献外，还大量传播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介绍西方国情、地情和各种政治学说的文献。从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形式看，西方文献在中国传播交流成为中西文献交流活动的主流，而中国文献向西方的传播交流则退居次要位置。《洋事杂录》、《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中国人传播的西学文献，主要介绍西方国情和史地的文献，反映了近代中国最初了解研究西方的认识水平，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为学习西方之长，促进西学文献在中国的传播交流起了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作用，洋务运动时期，京师同文馆翻译馆的建立，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参与到中西文献交流活动中来。洋务派成为西学文献引进、传播的主导力量，它们将欧洲近代科学的一些重要成果通过西学文献引进国内，促成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确立和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同时把近代中国认识

西方的水平，由“船坚炮利”的感性层面，提高到了解西方科技文明的层面。维新变法时期，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引进，对维新志士起了重要作用。维新派人士严复翻译引进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著名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内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时期所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引进，对近代中国的变法改良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的传播引进推向高潮，这个时期西学文献不仅仅是新知识的传媒，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思想武器，为推翻满清统治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个时期中国人自己引进翻译的西学已占大多数，改变了长期由外国传教士进行翻译的主导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留日学生，为当时的西学输入大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文献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已传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是《近世社会主义》（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该书是近代中国较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随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先后介绍引进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但是真正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为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

文献和文献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纵观中西文献交流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西通过文献交流，使之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具体地说，中西文献交流对于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将丰富的信息带往各国

无论是先秦时期，汉至元代时期还是清末至“五四”以前的时期，通过文献交流都使被交流的各国得到了丰富的信息来源。这在中古以前的时期，人类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用文献交流来获得各国的信息，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部12卷的巨著，把玄奘西行游历十余年中所见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国加以分类记叙，举凡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都一一陈述，内容广博，条理清晰，记述正确，成为研究中亚、西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东晋）法显《佛国记》不仅是研究四、五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的宝贵文献，也是研究这时期中国西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意）马可·波罗的《游记》被欧洲誉为“世界一大奇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它第一次用文献把古代中国向欧洲作了比较全面的通报，《游记》成了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窗口，欧洲人从《游记》中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比在此之前从宗教游历者和商业旅行者那里听到的传闻要系统得多。《游记》成了当时西方了解中国最方便、最明晰、信息量最大的文献。